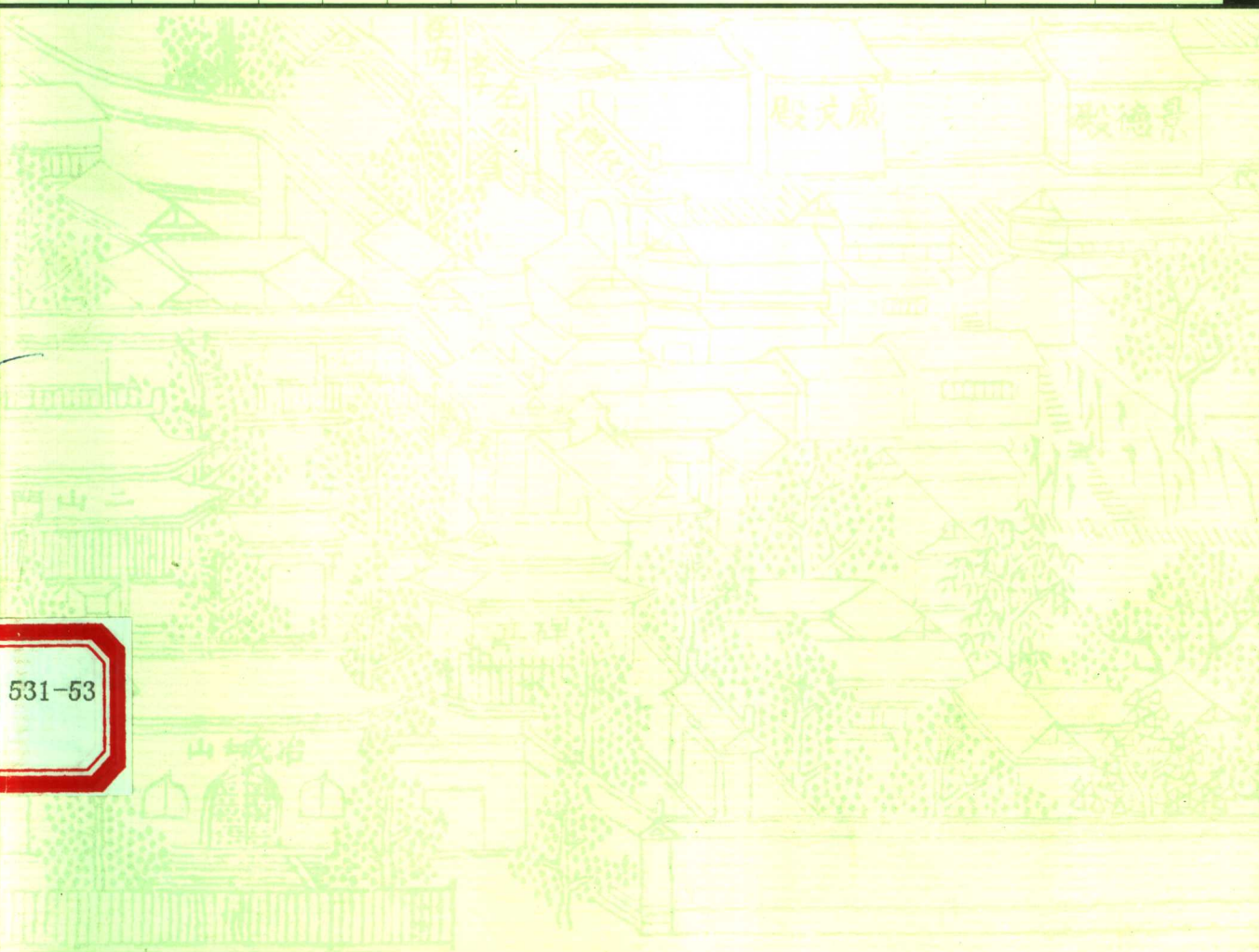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社

冶山存稿

南京文物考古论丛

邵磊 著



【冶山存稿】

南 京 文 物 考 古 论 丛

邵磊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冶山存稿——南京文物考古论丛/邵磊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4. 5

ISBN 7-80643-836-X

I. 冶... II. 邵... III. 文物—考古—南京市—文集 IV. K872.5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6313 号

- 书 名** 冶山存稿——南京文物考古论丛
著 者 邵 磊
责任编辑 高思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纯化路 29 号 邮编 224001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插页 2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836-X/K·250
定 价 38.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自三代以来，古贤遗迹著于金石载籍者多矣，然时移世易，存于今者什不得一。良以岁月久远，风雨侵蚀，磨灭残毁，理亦宜然。迨赵宋间，欧、赵之录出，以时代为次，始三代秦汉，迄唐五代，录其全文，附以考证，读之者了然如指诸掌。夫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盖记述多出后人之手，载笔不能无失，独金石出于千百年前，犹能得见古人真面目，故可宝也。金陵邵君磊，幼学媚古，近以所著《冶山存稿》相示，属系数语，以弁其端。自惭毫朽，闻见浅鲜，深愧不能读先生之书，勉力披阅，中多记碑碣、官私印章、钱币诸文，博学明辨，考订精核，时代自汉魏迄明清，地域则在金陵百里间，皆身历其境，目睹其物，自非有绝人之识，为日久而用心专，安能为此常人之所难为哉！此书出，不仅备一方之掌故，且可补地志之所阙，试质之邵君，其以吾言为然乎否？

沈燮元谨识于吴门寓庐

二〇〇四年三月

序

说起来也是有缘,1997年,我受当时南京市文物局局长谭跃同志(现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的委派,想创办一份文博方面的杂志,需要增加得力人手,于是,我从南京市博物馆挑选了邵磊同志。后来,我又负责筹建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他自然就成了研究所的业务骨干,直到2002年春天,他离开文物研究所,重新回到市博物馆,不久,我也前往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从1997年到2002年将近六年的时间里,我们朝夕相处,共同组织、编辑过《文博通讯》、《南京博物馆巡礼》、《南京文物丛书》、《南京文物精华》等多种文博、考古方面的图书;一起栉风沐雨,调查、勘探六朝石头城遗址、六朝帝王陵遗址和历代石刻遗存;携手发掘过明孝陵宫门、东西配殿等基址,明东陵寝园遗址,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栖霞山南朝石窟遗存,梁南平王萧伟墓阙,南唐吴宣懿皇后墓以及南京近郊的一批六朝墓葬,在南京市区更是调查或清理了数十处建筑工地的古代遗存。那几年,不仅野外工作异常繁重,而且研究所考古经费紧张,为了尽量节省开支,把有限的科研经费用于田野考古上,我主张考古人员不拿野外补贴,邵磊同志作为业务骨干,对此做法毫无怨言,一直默默地工作着,成为事业上的好帮手、好同志。从这件事上,我看到了他一心想着学术、乐于为事业奉献的良好品质。

在长期的相处中,我发现邵磊同志还有着善于治学的特点。以他这本文集为例,收入的文章达27篇,计30万字(根据我的了解,这只是他已有的科研成果中的一部分),内容涉及到文物和考古科学的四个方面:钱币学、铭刻学、佛教艺术、书印史。可以说,他研究的领域都属于冷门,需要较宽深的学术功底和较专门的知识储备,还要愿意长期坐冷板凳,邵磊同志不仅热心投身于其中,而且还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尤其让我钦佩。这次他要我为他的文集作序,尽管对他研究的领域我并不太熟悉,但还是应允了,这是我出于对他做学问之执著和已有成绩的敬重。

尽管过去我已知道他的主要科研方向,又读过他发表的大多数文章,有的文章在他研究期间还和我进行过讨论,但这次重新阅读这批成果,还是让我深有感触,借此机会,我想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邵磊同志做学问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善于在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而且往往能谈前贤之未及,补以往之局限,这是一种硬功夫,没有长期的积累是做不到的。如他对晚清时毗陵(今江苏常州)出土南朝刘宋孝建四铢钱币拓本的再释,对1935年冬天南京通济门外草场圩发现的萧梁时期铸钱遗存的重研,对元末陶宗仪《古刻丛钞》中所录刘宋两方墓志志文的疏证,对镇江焦山《瘞鹤铭》时代及书人的考订,对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八相图的补析,均收到耳目一新之效。试举几例如下:

《瘞鹤铭》是声闻海内外的名品,宋代以来,对其时代与书者之考证文章络绎不绝,亦已形成几种权威的说法,邵磊同志不满足于此,他基于考古学的方法与材料,并吸取前人诸说中的有益成分,对《瘞鹤铭》之时代和书者做了几乎是全新的考证:第一,将其时代圈定于南朝陈代;第二,否定了其为王羲之或陶弘景等历史“闻人”作品的旧论,认为它实际出自某位名位不显的官府文吏之手,然并不否定其独有的价值。全文征引繁复,资料详备,堪称近年来所见有关《瘞鹤铭》研究的扛鼎之作。再有关于南京栖霞寺南唐舍利塔《八相图》之研究一文,诚如作者所言,该遗存是江南地区仅见的中古时期佛传图,但这一在宗教史和艺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浮雕作品,近代以来除向达先生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二月匆匆做调查并诉诸文字以外,几乎再无专门的叩问者。据我所知,邵磊同志于1994年和1999年至2000年先后两度参加分别由南京市博物馆和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主持的栖霞山石窟考古项目,他在工作之余,得以对位居千佛崖之旁的南唐舍利塔遗存做深入观察,并激发起重做研讨的信念,经过努力,他不仅补订了向达先生所做的文字,而且证明栖霞寺舍利塔《八相图》是属于小乘佛教系统的作品,阐明该作品因要满足为宗教服务之目的,故在技法上表现出早期山水画创作所特有的稚拙和近于图案化的风格,因此具有不同于其他作品的美术史意义,其画面中的建筑及其制度则反映了南唐中晚期的社会现实,对认识南唐一代的相关历史具有特殊的价值。此外,六朝墓志及相关的书法史研究,是学术界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其中许多观点已被反复论证,形成定说,而本书作者在广揽出土材料的基础上,对前人诸论各各辨析,提出一系列新说:南方六朝早期墓志的两种风格及其来源问题;谥道列志的制度史意义;南朝龟趺碑形墓志源于东吴、西晋;南朝墓志书人为身份较低的书吏;六朝时南北铭石书法交流受南北文化地位消长的制约;墓志书法的保守性及其与南朝书坛真实面貌的关系等。这诸多新颖的观点和敏锐的发现,不仅有助于纠正一些既成结论的误失,而且也今后更加科学地评价东晋南朝墓志书法的意义和价值、更多地从文化变迁过程和文化分层的基础上研究六朝墓志及所涉六朝书法问题提供了事实上的参照。

第二,他做学问强调实证,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是从具体的实物出发,不作空论,同时又十分重视科学的方法,善于运用考古类型学,把握实物的细节和特点,寻找材料所能反映的有关事象的发展脉络和本质,这也是经过长期的自我严格训练的结果。如他利用南京东八府塘西井巷出土的一批“公式女钱”钱范作为实证材料,系统梳理了梁“公式女钱”的形制、演变、铸工、钱文、衡制等诸多问题,用确凿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推翻了过去钱币学界有关梁“公式女钱”形制的共识,将这方面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还用镇江医政路萧梁铸钱遗存出土的陶制佛塔模型探讨了南北朝时期覆钵式塔流布中国南方的过程及相关问题,文章以微见著,分析了起源于印度的覆钵式塔的造型演变过程和流布中国后的种种史迹,明确提出“西来的覆钵式塔除由丝绸之路传入洛阳外,其影响也曾波及六朝时期的镇江以至于南半个中国,这无疑大大丰富并拓展了学界关于早期覆钵式塔样在中国传播范围的旧有认识”。他对该遗物上出现的尖拱龕、合掌印坐佛形象等也做了精到的分析,对研究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佛教造像问题亦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再上点,自北宋以来,对秦朝印章做研讨者代不乏人,但邵磊同志发现,过

去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几乎都是着眼于未经科学发掘的传世品,而这类材料由于缺少准确的出土地点、地层和共存物,很难据以解决学术根本问题,甚至其中还有伪品混入,扰乱视听,有鉴于此,他强调必须采取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收集各地秦代墓葬、遗址、窖藏中出土的印章,总结其印文风格、笔画形态及钮式特征等,并归纳出若干共性,然后以此为标尺,从众多的传世品中鉴别出秦代印章,这确实是文物研究中的精辟之论,即既要重视当代考古学资料的运用,也应对历史上的金石学成就作科学的分析,取其精华,订其失误,作者正是凭借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战国玺印、秦印、西汉私印、汉晋官印等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邵磊同志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既尊重前辈,但又不唯上,只求真,且述而有据,独辟蹊径,力成一家之言。如四川茂汶早年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造像碑,是佛教考古界十分熟悉的重要材料,常常被作为南北朝时期“褒衣博带”佛装由南而北传布的重要例证,但邵磊同志从造像风格、发愿文内容及其书法特征三个方面对这件造像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由此,也导致人们重新审视“褒衣博带”式佛装产生及传播的一系列问题。他在对南京栖霞山千佛崖释迦、多宝并坐像的考察中,对这一问题还做了更深入的探讨。专家们一般都认为,北魏洛阳龙门石窟及大同云冈三期龕像中所见的“褒衣博带”式佛装是接受了东晋、南朝的影响而形成的,但邵磊同志对此说所据的考古材料如茂汶的“齐永明元年”款造像碑之真伪作了重新考订后,认为它们都无法提供该式佛装先兴起于南方再影响到北方的有力证据,因此,这一传统说法应予重新检视,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自3世纪下半叶至6世纪初的南方佛教造像艺术,根本就是在中原北方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那么,南京栖霞山千佛崖二佛并坐像所着胸前结带、衣摆长垂的“褒衣博带”式僧衣式样也应是最早见诸北方,而后流布南方的。当然,我自己认为,关于“褒衣博带”式佛装究竟起源于南方还是北方,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做多方面的考察才可以下结论,但邵磊同志不满足于人云亦云,而是能够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和分析,对已有的定论提出自成一说的诤疑,以此推动对有关问题的讨论,这种治学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在邵磊同志的这本文集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很有意义的材料和观点,有利于加深对相关文物的鉴别和相关学术问题的理解,应该说,这是一本有质量、有个性、值得一读的好书。

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都,保存下来的文物资料异常丰富而重要,十分需要一大批像邵磊同志这样专注于研究相关实物材料的年轻学者,可惜目前这样的人才还太少。科学研究的天地无比广阔,所谓学无止境、学海无涯均为至理,在这里,我既祝愿邵磊同志继续努力,不断拓宽视野,增强理论思维能力,取得新的成绩,同时也祝愿南京的文物研究学术队伍日益壮大,以无愧于先人的创造,适应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及文化的需要。

贺云翱写毕于南京大学文科楼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五日

目 录

铸泉考实	(1)
元嘉四铢钱范探究	(3)
《毗陵出土孝建四铢拓本》初识——谈道光年间常州出土刘宋钱	
币窖藏	(9)
南京隐龙山刘宋墓出土钱币的初步整理	(23)
梁铸公式女钱考述——兼论南京出土的公式女钱范	(29)
对南京通济门草场圩萧梁铸钱遗存的整理	(40)
南京小营花红园萧梁铸钱地点初探——兼论镇江医政路萧梁铸	
钱遗址	(47)
萧梁钱范的残留物初步研究	(54)
南京出土萨珊卑路斯银币考略	(61)
佛迹探微	(67)
南京栖霞山千佛崖释迦、多宝并坐像析	(69)
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质疑	(83)
析镇江萧梁铸钱遗址出土的塔形佛饰	(87)
栖霞寺舍利塔八相图及其所反映的问题	(95)
云南沐氏与花岩寺——从花岩寺钟铭的发现谈起	(111)
古刻新研	(119)
六朝墓志摭谭	(121)
六朝草书砖铭概述	(133)

刘宋临澧忠侯《刘袭墓志》疏证	(138)
南齐《王宝玉墓志》考释——兼论南朝墓志的体例	(151)
《瘞鹤铭》的时代与书人	(156)
北魏《宇文永墓志》考证	(182)
明定远将军《丘礼墓志》考证——兼述明初墓志体例之成因	(187)
玺印鉴真	(193)
战国古玺的国别鉴定及其有关问题	(195)
秦代印章初探	(210)
西汉私印断代探述	(217)
南京市博物馆藏汉晋官印考略	(224)
南京江宁区湖熟镇出土汉印小考	(232)
早期牌印制度的实物见证——记南宋荣州防御使印及印牌	(237)
近百年来诸种中国书法篆刻史著述评估	(242)
后 记	(248)

铸泉 考实

以下的一组钱币学论文,其特色大致有三:

其一,论文的论题多关注于六朝时期的南朝钱币。这是中国钱币学和货币史的一个关注重点,其时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铸币多变,而有关钱币史料却散乱缺失。故此,论题探求南朝的钱币历史,寻其本来面目,使这些论文皆有“的”而发,具有可读性。

其二,论文所据材料多出于考古发掘所得。新旧钱币学研究的区别突出的表现在有无科学考古材料的支持。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大量考古出土钱币材料的被发现,就很可能突破原来构建在钱币传世品和有限文字资料上的旧说。作者从事考古工作多年,又占有在南朝故地的地利,故能充分发现和使用有关南朝钱币的出土材料,由地点、地层、伴出物等确定钱币的时代、性质、分类,此类依据自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如在《梁铸公式女钱考述》中就指出:“南京东八府塘西井巷的减廓五铢泥范,即是千百年来钱币学者们苦心孤诣、孜孜以求的梁公式女钱的铸范。”并从而对众说纷纭的梁公式女钱的细部特征明确为“其钱面俱无内外廓,钱背无外廓而有内廓”。并参证文献,将Ⅰ式公式女钱范系于天监元年初铸时所用,将Ⅱ式公式女钱范系于20年后普通三年铸时所用,言之成理。

其三,研究方法亦有特点。一是注意使用了类型学的方法。同是五铢,粗看相仿,细分则在材质、轻重、大小、厚薄、文字、穿廓、制作精粗等方面有种种不同,正是这形形色色的差别造成了不同五铢钱的特色,这类差别的分辨最宜使用类型学的方法去分析。《〈毗陵出土孝建四铢拓本〉初识》即是以类型学方法分析毗陵出土钱币资料,从而勾勒出了南朝刘宋时期(元嘉)四铢、孝建四铢、孝建钱的比较全面的形态。

二是钱币涉及多种学科,其中与铸造技术,与钱范关联甚多。从钱范、从铸造技术考察各朝钱币是其研究方法的又一特色。如在《梁铸公式女钱考述》中,作者认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一品钱范并非梁铸公式女钱范,即是从浇铸工艺角度立论而辨析之。

其方法的第三特点是注意使用了先进的检测手段。

总体而言,对南朝钱币具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了解其症结所在,敏锐地发现新的材料,以科学的方法去处理这些材料,从而得出新的认识,这是以下八篇文章的成功所在。相信随着新材料的进一步发现和整理,作者今后在钱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金德平



元嘉四铢钱范探究

南朝刘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冬十月戊午,京师建康设钱署铸四铢钱(元嘉四铢)^①,这是中国货币史上极不寻常的重要举措。其特殊意义在于:一方面,这次开铸铜钱,正式结束了自西晋以来一个半世纪政府未尝铸钱的非常情形,使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得到必要调剂,标志着刘宋货币经济已较前有所发展;另一方面,自西汉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初铸五铢钱以来,历朝以重量单位为名的铸币,皆沿用了“五铢”这一称谓,元嘉七年(430年)所铸四铢钱,则使得铸币的单位名称与法定重量相一致,不啻为刘宋政权意欲整顿与健全钱制的一次尝试。

但由于当时铜源匮乏,加之政府财政困难以及铸币成本高等一系列因素,“四铢”新钱铸量不大,而能留存至今的自然更为稀少。

1999年岁末,笔者应南京古玩收藏家杨立昌先生之约,与来自钱币学界的几位朋友共同观摩了杨先生收藏的多种钱币珍品,内竟有一片其早年购藏、仅残存单枚型腔的刘宋元嘉四铢陶质钱范(照片一)。

稍后在《江苏钱币》2000年第1期上,又发表了南京钱币收藏家孙敏先生于1997年7月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购藏的四片元嘉四铢钱残范的照片,同时一并配发了由孙敏先生撰写的相关介绍文章。这样,凭借杨、孙两先生所藏的五块钱范残片,同时辅之以传世或出土的刘宋铸币实物,业已形成了一个可供深入探究四铢钱颁铸诸事的考察块面,相关问题的研讨遂可由此入手进行了。



照片一

一、南京发现的元嘉四铢钱范

新发现的五块刘宋元嘉四铢陶范残片,皆为用来铸造钱币的子范,以淘洗较为细腻均匀的陶土制成,经火焙烧,质地坚硬,断面气孔尤多,可见其有良好的透气性。范面、背不甚平整,表面整体呈现灰黑色。

根据形制的异同,上述五枚元嘉四铢范片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为残存单枚钱币型腔者,其外廓皆已不存,共四片。此类范片(以杨先生所藏为例)厚4(范面及面穿部分)至3(钱肉部分)毫米,范面钱型直径19毫米,方穿凸面宽9毫米,外廓槽宽约2毫米。面穿凸面左右两侧分别置有反书阴刻“四铢”二字篆文(图1),钱文规整,笔画清晰,“四”字形体略显宽扁,上下均低于面穿,写作“四”,笔画横竖同粗,转折处俱成直角,极为方正,不见圆弧笔触或斜笔,其左边的竖笔与面穿并合。“铢”



图 1



图 2

字纵长略同穿宽,另“金”部与“朱”部亦上下平齐,笔画明显呈横粗竖细之势。“金”部字头作等腰三角形,四竖点短直匀称,其左侧笔触因遭外廓槽侵压,以致笔画不全;“朱”部上下拐角皆方折,尤以上部为甚,其左侧笔画与方穿凸面并合。范背型

腔无文(图 2),亦置凸面方穿,边长 9 毫米,沿穿边四面设宽 1 毫米的浅细内廓槽。范片不甚平整,表面皮壳亦见剥落。其中,由孙敏先生收藏的两枚范片,钱型的背面与面文“四铢”二字相对应的部位,还对称挖出直径皆为 2 毫米的圆形阴纹星点。

从保存现状来看,上述四块仅存单枚型腔的钱范残片,彼此之间还是存在着细微差异的,如孙敏先生的藏品中有两片明显经人为磨损,以至于钱文浅细,背面凹陷之星点近平,但其总体特征仍与未遭磨损者别无二致。

另一类范片只见有一枚,为仅存少许铸币外廓槽的范边残片(图 3),残长 12 毫米,残宽 5 毫米,厚 4 毫米,范片边缘距铸币外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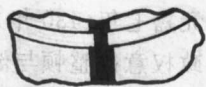


图 3

槽 4 毫米。从以上刘宋元嘉四铢陶范的细部特征所体现出来的制作工艺的规范性,可以看出其为官铸无疑。另一方面,上述刘宋元嘉四铢陶范所确立的标型特征,在刘宋一朝的铸币中,也颇多可资辨析、比对之处。

元嘉四铢陶范钱型的面文撑满钱面之间,远不若后来刘宋孝建年间所铸孝建四铢那样显得宽绰。如较为繁复的“铢”字,笔画皆为横粗竖细,盖以竖画多而横画少、又兼钱面狭促之故使成;反之,明显疏简的“四”字,其横竖笔画就表现为粗细一致,益可证明“铢”字笔画横粗竖细之成因正在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元嘉四铢之“铢”字,因笔画繁密而表现为横粗竖细的灵活手法,至孝建年间所铸孝建四铢,则已呈现出程式化倾向,即便是笔画稀疏的“四”字,也不例外地表现为横粗竖细,明显流露出追求齐整划一的唯美思想。

上述诸元嘉四铢陶范中,唯杨立昌先生所藏一品,至今尚存初出土时附着的黄绿色沙性黏土。按此种沙性黏土在南京东南城区的六朝至唐代地层中分布甚为广泛,其性状较干涩疏松,嗅味腥臊,触鼻可畏,所含杂质亦多。凡南京东南城区六朝地层中出土的青瓷片、瓦当及其他遗物,表面大多粘附有这种黄绿色沙性黏土。这与元嘉四铢陶范本身所属年代亦是吻合的。

二、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 元嘉四铢出土地点与刘宋钱署位置的推断

据文献记载,南朝自宋文帝刘义隆于京师建康(今南京)设钱署起,迄于陈亡,铸钱达十余次之多,其中以刘宋元嘉七年(430 年)所铸四铢(即元嘉四铢)为最早,以刘宋及萧梁二朝铸品最多^②。按文献所载南朝铸钱事迹,除齐武帝永明八年(490 年)铸五铢于四川蒙山的西汉邓通铸钱旧址,“因功费多乃止”^③外,其余诸钱之初铸,大都应系于京



师建康(今南京),而且这已屡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如1935年12月和1998年4月至6月,在南京的光华门外中和桥南草场圩与东八府塘西井巷,分别发现了梁五铢和公式女钱铸坊遗存^④。通常,古代铸币生产的理想环境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制作陶范宜就地取材;二是为取水以及运输原材料与成品的便捷,需地近江河。南京中和桥南草场圩与东八府塘西井巷一带原本皆为地势高低起伏的丘陵地段,土壤为粉黏质黄土,颗粒较细,少杂质,是制作铸钱陶范的上佳原料。又,两地均濒临发源于句容的南京地区第一大河——秦淮河,运输原料、成品乃至取水之便捷自不待言。且两地均位于南京东南地区,相互间地理位置十分靠近。可见,秦淮河流经南京东南城区的沿途,成为南朝时期较为理想的铸钱之地。

另承杨立昌先生见告,他所收藏的表面尚粘附黄绿色沙性黏土的元嘉四铢陶质范片,系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土于南京夫子庙地下商场建筑工地,当时钱范出土较多,但皆破碎不堪,即便只存完整的单枚铸币型腔者亦寥若晨星。与钱范同时伴出的尚有大量未见使用痕迹的铁五铢钱及木炭块等铸钱遗物,加之该地临近内秦淮河(当时施工现场与内秦淮河最短距离不足50米),与中和桥南草场圩及八府塘处于同一区域,符合南朝铸钱作坊的选址要求。故不难想见,今南京夫子庙地下商场一带正是刘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冬十月戊午首立钱署所在地。有必要指出的是,80年代初修建夫子庙地下商场时,所触及到的恐非该地刘宋钱署废弃堆积的全部,稍后在南京内秦淮河清淤时,又陆续见有零散的同类钱范出土^⑤。

(二) 刘宋铸钱工艺辨析

近年来,有的研究者通过对以元嘉四铢及孝建四铢为代表的刘宋铸币的排比分析,认为南朝刘宋某一批钱币凸起于廓外的星点纹,有呈规律性分布的特征,并判断这些星点系以母钱法铸钱、翻制砂型时,用特制模板在型面上压出的标志,使母钱排布时得以依此定位,并将上述星点命名为“定位星”^⑥。推测翻砂法铸币早在刘宋时已与陶范铸钱法并用,且已居于主导地位^⑦。

但据笔者所了解的大宗刘宋铸币出土情况,可知刘宋钱币在轮廓外残存星点的情形并不普遍。此外,不少刘宋铸币上常残留有细长的凸起隔纹状流铜(图4、5),也大都为陶范铸钱在阴干或烧制过程中产生的裂纹所致,另有少量则可能是多浇口残茬的遗存。

总之,刘宋铸币形制上的种种迹象所反映出来的,更多还是出自范铸的证据。而南京发现的刘宋元嘉四铢陶质钱范更纠正了有关刘宋铸币系出砂模铸造的观点,这应是上述刘宋元嘉四铢陶范出土的另一个重要意义。



图4



图5

值得一提的是,除新见刘宋元嘉四铢钱范外,南京、镇江两地还先后发现过三处被推断为梁天监五铢及公式女钱铸坊的钱范堆积^⑧。由此可证,无论对于朝廷或者地方豪强势力而言,用范铸法铸钱,在整个南朝时期未曾变更过。因此,古代文献中直至北宋始再三出现翻砂铸钱的相关记载^⑨并不是偶然的。



从陶土构造以及形态等方面着眼,不难发现上述呈片状的刘宋元嘉四铢陶范,实为范体正、背面对置钱面和钱背型腔、直接用以铸钱的子范,具体形制与南京、镇江等地发现的梁五铢范及公式女钱范十分相似,均为双面型腔式叠铸范,浇铸时系将范片层层相叠,合成后由范片中心所设共用的漏斗状圆形浇道注入铜液,再经支槽流入槽端型腔,从而达到充实漫溢的效果,使铸币成型。按此种双面多层叠铸工艺,以往仅知萧梁一朝铸天监五铢及公式女钱时已经非常成熟,现可证此种双面型腔叠铸工艺早在刘宋时期已然出现。

刘宋铸元嘉四铢陶质子范本身,或为目前所见采用双面多层叠铸(钱)最早的实物范例,但此种双面多层叠铸(钱)工艺是否即源于刘宋元嘉七年(430年)初铸四铢,却仍值得斟酌。据1975年10月在江苏句容葛村发现的东吴“大泉五百”、“大泉当千”铜钱及铸芯等铸钱遗物,不难推知东吴铸钱亦采用了双面多层叠铸工艺^⑤,亦可证开南朝铸钱风气之先的元嘉四铢,在具体的制作手法上,还是远承了江南旧时的传统铸钱工艺。值得一提的是,同为双面多层叠铸钱范,刘宋四铢钱范表面粗糙不平,气孔尤多,远不若之后萧梁钱范制作精细平整,规范划一。又新见元嘉四铢范片的平均厚度为3.0~3.8毫米,略见厚重,不如后来仅2.5~3.0毫米厚的梁天监五铢及公式女钱陶范片来得轻薄,显示出萧梁钱范泥料的拍土节约和范片利用率之高。凡此种种,可见自刘宋以迄萧梁,制作钱范的技术难度渐次递增。另一方面,刘宋元嘉四铢钱范在制作上的稍显粗糙,也客观反映出了刘宋元嘉七年(430年)铸发四铢之际,因“泉铸岁远”而导致手工业者难免技艺生疏的客观状况。

(三) 关于元嘉四铢减重的考证

据《宋书·颜峻传》:“元嘉中铸四铢钱,轮廓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但以刘宋财政困难以及铜源匮乏的实际状况而言,采取铸币减重甚至不得不听任民间私铸,势所必然。故上述这条文献记载虽言之凿凿,却并不足以取信于人^⑥。甚至同书《何尚之传》即云:“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说法是与前者完全相反的。那么,刘宋元嘉四铢究竟是否存在盗铸呢?笔者认为,在没有为这一问题找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之前,简要归纳一下刘宋铸币的若干特征是非常必要的。

按四铢钱为刘宋一朝专铸。从元嘉七年(430年)初铸四铢,递次而至孝建四铢以及文献失载的大明四铢,由于受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铸币明显呈现日益减重的趋势,而钱文为适应日趋薄小的形制所作出的相应调适亦历历可见。结合位于今南京夫子庙地下商场的刘宋钱署遗址出土的元嘉四铢陶范残片,以及历年出土的与该范型吻合的四铢钱,可证开南朝铸币风气之先的元嘉四铢,其方正直折的钱文形态,至少在体势上与汉武帝元狩五年(118年)初铸五铢钱的钱文有着相当一致的气息。由此不难想见,在经历了“泉铸岁远”的时段后,刘宋初铸四铢确实是存在着效仿汉武盛世改革币制之本意的。但由于元嘉四铢较足重五铢钱减重百分之二十,形制稍小,钱文占地狭促,满撑钱面空间,甚至“铢”字“金”部为外廓槽侵压,以至破坏了钱文笔画的完整。至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铸孝建四铢及大明年间所铸大明四铢等年号钱,普遍较元嘉七年(430年)所铸四铢又趋薄小,但为避免钱文笔画缺损之弊,皆使钱文顺应迁就钱币之圆



弧外廓而扭曲形体。“铢”字“金”头亦由元嘉四铢所作等腰三角形一改为花叶形或上下俱尖的枣核形,有的干脆从简铸成一个重重的大黑点,“朱”部作圆弧折笔。钱文中密集的竖笔也纤细柔婉,状若铁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历代钱币中,还有一枚直径20毫米、重仅1.3



图6

克的减重元嘉四铢(图6),其钱文“铢”字形体竟有如后来孝建四铢那样迁就外廓之圆形轨迹而取弧曲之势,“金”头欹侧亦甚著,与新见元嘉四铢陶质子范及大量与之合符的钱币风格判然有别,流露出明显偏晚的时代特征,或即出自民间私铸。据此可证,《宋书·

颜竣传》中百姓不盗铸元嘉四铢的记载果若可信,当就元嘉七年(430年)初铸四铢之际而言,至迟约在宋孝武帝孝建前后,已出现了盗铸元嘉四铢。

存世刘宋元嘉四铢钱,凡2.6克以上的足重钱,近年来在南京溧水、^⑧重庆忠县^⑨等地多有发现,传世品也存留不少,其规制及钱文形态尽与新见元嘉四铢陶范吻合,故可知这类足重钱,率多为刘宋元嘉七年(430年)冬十月戊午于京师建康所立钱署出品。

(本文原刊于《中国钱币》2002年第2期)

注释:

①详见《宋书·文帝纪》。

②有关刘宋及萧齐二朝的铸币事迹,详见邵磊《梁铸公式女钱考述——兼论南京出土的公式女钱范》文后注①,《南方文物》1998年第4期。

③详见《南齐书·刘峻传》。

④南京光华门外草场圩发现梁五铢钱范事,郑家相刊于《泉币》总第7期的《梁五铢土范图说叙言》及朱俊《金陵古迹图考——萧梁一代之文物》述之甚详。南京东八府塘西井巷梁公式女钱铸坊的考古发现,详见邵磊《梁铸公式女钱考述——兼论南京出土的公式女钱范》,《南方文物》1998年第4期。

⑤孙敏先生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购得四枚元嘉四铢范片时,经向售者了解,得知该四枚范片系十年前在南京内秦淮河清淤时发现,倘售者所云不谬,则当年在建夫子庙地下商场时并未完全掘毁刘宋钱署堆积的推断应是可信的。

⑥⑦参见袁涛《定位星是我国早期砂模铸造的重要标志》,《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⑧有关镇江萧梁钱范的出土发现,详见镇江古城考古所(刘建国执笔)《镇江市萧梁铸钱遗迹发掘简报》,《中国钱币》1993年第6期。

⑨参见刘森《有关翻砂铸钱工艺的两则史料》,《安徽钱币》1992年第2期。

⑩句容葛村发现的东吴钱币铸芯长约140毫米,另由发掘者据与铸芯相连、多达25层的支槽流铜所绘东吴钱范复原示意图,推算出合成完整钱币型腔的每层范片平均厚度仅为5.6毫米。参照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叠铸用范片渐趋减薄的趋势,并考虑到东吴钱币的厚重特征,推断东吴已采用双面型腔式叠铸陶范铸造“大泉五百”及“大泉当



千”应是信而有征的。

⑪ 如罗宗真《南朝货币和经济发展》即云：“元嘉七年皇帝下令设立钱署，开始铸造四铢钱……于是民间盗铸，或剪凿古钱取铜代钱的现象产生。”详见《南京博物院集刊》第9辑。

⑫ 溧水县博物馆《江苏溧水县寺桥发现刘宋时期货币》，《中国钱币》1992年第3期。

⑬ 钟治、唐飞《重庆忠县出土刘宋货币考》，《中国钱币》1999年第3期。